



人民音樂家

# 洗星海



4/4 -3/4 -2/4 星海悼歌 力揚 詞 蘇明 曲

慢板 Kb=5  $\overset{b}{7}$   $\overset{\vee}{6}$   $\overset{\vee}{5}$   
 5 | 4.5 2.1 2.6 |  $\overset{b}{7}$   $\overset{\vee}{6}$   $\overset{\vee}{5}$  | 6 1 2 45. 31 | 2. 2 4 |  
 在莫斯科藍色的天空下，你音樂的大星殞落了！你要

2 1  $\overset{\vee}{6}$  | 4 5. 6 5 | 4 4 5 | 6.5 4 3 | 2. — | 2. 1 1 | 中快板  
 永遠地安息在那自由，美好的地方。 你底

2. 1 |  $\overset{\vee}{6}$  2 1 | 5 4 0 5 |  $\overset{\vee}{6}$  5 5 | 1 4. 0 3 | 2. 2 2 |  
 歌是人民的呼聲，像黃河的雄壯，奔騰！你底

5. 2 |  $\overset{\vee}{1}$ . 6 5 1 | 2 4 0 2 4 | 5. 4 5 6 | 5 4 0 6 |  
 歌是戰鬥的號音，鼓點着我們團結，前

2 — | 2. 1 2 | 3 1 6 5 6 | 1 5 1 2 | 3 1 |  
 進！ 你把生命獻給了藝術，你把工作

3 2 1 | 2 1 6 5 | 2 3 2 1 | 6 1 6 | 5. 6 1 | 4  
 獻給了人民；你是革命者的好模範，你是藝術

5. 6 | 5 4 6 | 5 — | 5. 5 | 4.5 2 1 2 6 |  $\overset{b}{7}$  6 5. 5 |  
 家的好典型。 在莫斯科藍色的天空下，你

6 1 2 4 5 5 3 1 | 2. 2 2 5 4 | 2 1 1 6 1 2. 6 5 |  
 躺下了戰鬥的生命！但在祖國解放的大地上，會

2 2 2 1 2. 4 | 5 5 4 5 6 | 5 — . 0 |  
 永遠留着你的事業和歌聲！

---

## 人民音樂家洗星海年譜紀略

---

1905 生於廣東番禺縣。母蘇英，係農村婦女。父洗喜泰以漁航爲業。星海生時父已逝世，幼年依祖父生活。

1911 七歲。祖父逝世。隨母去南洋；母親傭工以維持母子生活。是年入舊式學堂，讀四書五經，凡四年。

1915 十一歲。入英人設立之英文學校，習英文一年。翌年——十二歲，改入中國人辦之高等小學，凡兩年。

1918 十四歲。回粵入嶺南大學附中，半工半讀。

1924 三十歲。大學學習結束。此後兩年曾做打字員班長、工人夜校教員及嶺南大學音樂教授等職業。

1926 二十二歲。去北平入北大音樂傳習所（北平藝專？）修理論及小提琴。同時兼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。

1927 二十三歲。下半年去上海入國立音樂院。後因鬧學潮反對學校反動措施，被開除。（張曙被捕下獄）

1928 二十四歲。加入田漢組織之南國社。擔任光。

1929 二十五歲。赴巴黎。1930,6,回國參加國坊音樂運動。1937 八一三後赴武漢，領導抗戰音樂運動。1938 赴延安就教魯迅藝術學院。（以上請閱從巴黎到延安文）

1939 三十五歲。六月加入共產黨。

1940 三十六歲。完成其第一交響樂。年底赴蘇聯。

1945 四十一歲。十月三十日以肺病逝於莫斯科。



## 人民音樂家洗星海

目 錄	星海悼歌.....	力揚·蘇明
	星海年譜.....	編者
	從巴黎到延安.....	星海
	憶洗星海.....	馬思聰
	悼洗星海先生.....	沙汀

中國著名音樂家洗星海先生，因患肺病不治，  
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逝世，享年四十一歲。.....

✻ 小螢出版社出版 ✻

# 從巴黎到延安

## ——我學習音樂的經過

冼星海

××兄：

我到這里已經一年多了，現在又是春天。每年春天，我總想多寫些東西，但是今年春天，怕還能更多寫一些吧。我剛剛寫完『三八』婦女歌舞活報，『樞盟大合唱』，又要開手寫『汾陽河』歌劇和『敵後抗日根據地大合唱』……

我住的地方是在一條小溪流入一條河的山溝邊，春天冰雪融化了，河水溪水凝重地磅礴地向東奔流，在柳樹枝頭抹着苔綠的包圍裏，禮堂——從前是個教堂——的雙塔尖插在明秀的天空，引起了異國的回憶，我想起你前次的來信。

你問起我的創作經驗，我覺得我還談不上什麼經驗，因為現在我也還在學習中。但為了答謝你給我的鼓勵，只好不避厚顏將學習的經過亂七八糟的寫下來，這樣的東西，怕於你沒有什麼益處吧！

## (一) 在巴黎

我曾在國內學音樂有好些年。在廣州嶺南大學教音樂的時候，感到國內學音樂的環境不方便，很想到法國去。同時，我奮想把我的音樂技巧學得很好，成功爲『國際的』音樂家。正在考慮之際，湊巧得馬思聰兄的幫忙，介紹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奧別多菲爾(Paul Oberdoeffler)給我，於是我下了很大的決心，不顧自己的窮困，在一九二九年離開祖國到巴黎去。到了巴黎，找到餐館跑堂的工作後，就開始跟這位世界名提琴師學提琴。奧別多菲爾先生過去教馬兄時，每月收學費二百佛郎(當時約合華幣十元左右)，教我的時候，因打聽出我是個做工的，就不收學費。接着我又找到路愛日·加隆(Noël Caillon)先生，跟他學『和聲學』，『對位學』，『賦加曲』(Fugue 一種作曲要經過的課程)，加隆先生是巴黎音樂院的名教授，收學費每月也要二百佛郎，但他知道我的窮困後，也不收我的學費。我又跟『國民學派』士苛藍港·多隆姆(唱歌學校——是巴黎最有名的音樂院之一，與『巴黎音樂院』齊名，也是專注重天才。與『巴黎音樂院』不同之處，是他不限制年齡，『巴黎音樂院』則只限廿歲上下才有資格入學。此外，他除了注意技巧外，對音樂理論更注意。)這個學校的作曲教授丹地(V. D'indy)學作曲，他算是我第一個教作曲的教師。以後，我又跟里昂古特(Lioncovrt)先生學作曲。同時跟拉卑(Labey)先生學指揮。這些日子裏，我還未入

『巴黎音樂院』，生活窮困極了，常常妨礙學習。

我常常在失業與飢餓中，而且求救無門。在找到了職業時，學習的時間却又太少。在此時期我曾經做過各種一樣的下役，像餐館跑堂，理髮店雜役，做過西崽(Boy)，做過看守電話的用人和其他各種被人看作下賤的跑腿。在繁重瑣屑的工作裏，祇能在忙裏抽出一點時間來學習提琴，看看譜，練習寫曲。但是時間都不能固定。除了上課的時間無論如何要想法去上課外，有時在晚上能夠在廚房裏學習提琴就好了。最糟的有時一早五點鐘起來，直做到晚上十二點鐘。有一次，因為白天上課弄得很累，回來又一直做到晚上九點，最後一次端菜上樓時，因為暈眩，連人帶菜都摔倒，被罵了一頓之後，第二天就開除了。我很不願把我是一個工讀生的底細告訴我的同事們，甚至連老板也不告訴，因此，同事對我很不好，有些還忌刻我，在我要去上課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給我做，還打罵我，因此我也常打架。有一個同事是東北人，他看見我學習時，總是找出事來給我做。譬如說壁上有一絲塵，要我去借傘等。但我對他很好，常常給他寫信回家(東北)，他終於感動了，把我特別看待，給我衣服穿等等。可是我還不告訴他我入學。

我失過十幾次業，餓飯，找不到住處，一切的問題都來了，有幾次又冷又餓，實在支持不住，在街上輾癱下來了。我那時想大概要餓死了。幸而總做幸碰到些救助的人，這些人是些外國的流浪者。(有些是沒落貴族，有些是

白俄。)大概他們知道我能彈奏提琴，所以常在什麼宴會裏請我彈奏，每次給一二百佛郎，有時多的一千佛郎。有對白俄夫婦，他們已沒落到做苦工，他們已知道了勞動者的苦楚，他們竟把得到很微薄的工資幫助我——請我吃飯。我這樣的過朝挨夕，談不上什麼安定。在有過好幾天，餓得快死，沒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館，大餐館中去拉奏討錢，忍着羞辱拉了半天得不到多少錢，回到寓所不覺痛哭起來，把錢扔到地下，但又不得不拾起。門外房東在敲門要房金，如不把討到的錢給他，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險。(其實不是爲了學習，倒是個活路。)有一次討錢的時候，一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把我的碟子摔碎，掌我的頰，說我丟中國人的醜！我常時不能反抗，含着淚悲憤得說不出話來。——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很不喜歡我，他們都很有錢，和有些領了很大一筆津貼，但却不借給我一文。有時，我並不是爲了借錢去找他們，但他們把門閉上，門口擺着兩隻到四隻擦亮的皮鞋。(男的女的)

我忍受生活的折磨，對於學音樂雖不灰心，但有時也感到迷惘和不樂。幸而教師們肯幫助我，鼓勵我，在開音樂會演奏名曲時，常送我票。奧別多菲爾先生在一個名音樂會裏演他的提琴獨奏 (THAÏS) 時，不厭我的窮拙，給我坐前排。這些給我意外的關懷，時時促使我重新提起勇氣，同時也給我擴大了眼界。我的學習自覺得逐漸有些進步，我寫了好多東西，我學習應用很複雜的技巧。

在困苦生活的時日，對祖國的消息和懷念也催迫着我



努力。

我很喜歡看法國國慶節和「貞德節」的大遊行。這兩個節是法國很大的節日，紀念的那天，參加的人非常擁擠。有整齊的步兵，衛隊，坦克隊，飛機隊等。民衆非常熱烈的唱國歌，三色國旗飄揚。我每次都很感動。在一九三二年，東北失陷的第二年，到那些節目，我照例去看遊行。但是那次羣衆愛護他們祖國的狂熱，和法國國歌的悲壯聲，猛烈地打動了我。我想到自己多難的祖國，和三年來在巴黎受盡的種種辛酸；無助，孤單，悲痛哀怨抑鬱的感情混合在一起；我兩眼充滿了淚水，回到店裏偷偷地哭起來。在悲痛裏我起了應該怎樣去挽救祖國的危亡的思念。

我那時是個工人，我參加了「國際工會」。工會裏常放映些關於祖國的新聞片，和有一些照片。我從上面看到了祖國的大水災，看到了流離失所飢餓死亡的同胞；看到了黃包車（人力車）和其他勞苦工人的生活；看到了一九二七失敗後黨派分裂的大屠殺……這些情形，更加深我的思念，隱憂，焦急。

我把我對於祖國的那些感觸用音樂寫下來，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樂寫下來一樣。我漸漸把不顧內容的技巧（這是「學院派」，藝術至上的特點），用來描寫訴說痛苦的人生，被壓迫的祖國。我不管這高尚不高尚。在初到法國的時候，我有藝術家的所謂「慎重」，我對於一個創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，或者一年寫一個東西。像小提琴及鋼琴合奏的「索拿大」我就花了八個月的功夫。但以後

，就不是這樣了。我自以為比較成功的作品『風』的時候，正是生活逼得走頭無路的時候，我住在一間七層樓上的破小房子裏，這間房子的門窗都破了，巴黎的天氣本來比中國南方冷，那年冬天的那夜又括大風，我沒有棉被，睡也睡不成，只得點燈寫作，那知烈風吹進，那油燈（我安不起電燈）吹滅了又吹滅。我傷心極了，我打着戰聽寒風打着牆壁，穿過門窗，猛烈嘶吼，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動。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、辣、辛、酸、不幸，都洶湧起來。我不能自己，借風述懷，寫成了這個作品。以後，我又把對祖國的思念寫成『遊子吟』、『中國古詩』和其他的作品。

我想不到『風』那麼地受人歡迎，我的先生們很稱賞它，舊歲的（現在已同情蘇聯）音樂家也是現在世界有名的音樂家普羅珂菲葉夫也很愛它。並且它能在巴黎播音（上面說過的「索拿大」也被播）和公開演奏。

大概因為作品和別的先生的介紹，我僥倖得識了『巴黎音樂院』的大作曲家普羅·刁客（Paul Dukas）先生，他是世界三大音樂家之一（印象派）。更僥倖的是他肯收我做門生，他給我各種援助，送我衣服，送我錢，不斷的鼓勵我。還派他的門生送我樂譜、香烟，（我當時不抽煙沒有收下）并答應准我考『巴黎音樂院』的高級作曲班。在這之前，一個法國的女青年作曲家，也給我很大的幫忙。她親自彈奏過我的作品，她鼓勵我不要灰心，她教我學唱，學法文，經濟上不時週濟我。（她的母親待我也很

好)在考「巴黎音樂院」的時候，她先練習了六個月的鋼琴爲我伴奏。

報考的那天，「巴黎音樂院」的門警不讓我進門，因爲我的衣服不相稱——袖子長了幾寸的西服——又是個「中國人」，我對門警說，我是來報考高級作曲班的，他不相信；因爲中國人考初級班的也很少，而且來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。高級班過去只有馬思聰兄入過提琴班。這樣就難怪他阻擋我了。正在爲難，恰巧普羅·刁客先生從外面來，他攀我的肩一同進去了。

我總算萬幸考入了高級作曲班，考到了個榮譽獎。他們送給我物質的獎品時，問我要什麼？我說要飯票。他們就送了我一束飯票。入學後，我專心學作曲，兼學指揮，並在「國民學派」士苛藍·港多隆姆學音樂理論。在生活上較有辦法了，學校准許我在校內吃飯，刁客先生更常幫助我。不過比起剛入來，我窮得多，學習上物質的需求還很難解決，如買書就不易，所以我幾次要求政府給公費。照我的成績及資格說來，是應得公費的，但祖國政府對我的幾番請求都沒答覆。後學校給證明，甚至當時巴黎市長赫理歐也有證明文件都不行。我很失望。我記得有一年，有個要人到巴黎來，找我當翻譯，我順便要求他給我想法資助去德國學軍樂，(那時我還未入「巴黎音樂院」)回來爲祖國服務。他那時雖是對外宣傳中國需要抗日，却不能答應我的請求。而我入了「巴黎音樂院」之後，要想望遙遙的政府給公費，自更困難了。結果是從始到終一文公

費也領不到，我在『巴黎音樂院』的幾年生活，只靠師長學校的幫助。

一九三五春，我在作曲真畢了業，刁客先生逝世，我就不能再繼續留在巴黎研究了。另一方面我也想急於回國，把我的力量貢獻給國家。所以臨行時，上面說過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勸我再留在巴黎，我也不肯再留，爲不却她的盛意，我給她說謊，半年後就回到巴黎來。我有許多曲稿還留在她那里，還有許多書及稿件也關在別處一間小寓所裏，因爲沒錢交房租，不能去取回來，大概現在還在吧！

一九三五年初夏，我作最後一次歐洲的旅行。幾年來我把歐洲主要的許多大小國家的名城、首都，都遊過了。增長了很多知識。最後一次到倫敦的旅行，却很不順利，登岸時，英政府不準我入境，他們看見我的證明文件及窮樣子以爲我是到倫敦找事做的，他們不相信我是旅行者，我被扣留了幾個鐘頭，虧得能打電話到公使館才釋放了，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是歧視的，英國的成見尤深。

## (二) 回到祖國

從倫敦回來之後，我就起程回中國了。

在回國的途上，因爲沒有錢，得了友人之助，坐了貨船。一路和回國工人水手一起生活，非常愉快。對於工人，我很合得來。其實我自己也算『半個』工人。在巴黎的近

郊，我參加過華工的一個很大的晚會，那時歐陽予倩先生也在，我爲工人們奏提琴，我自己也很快樂。這次回國，雖然享不到人們坐郵船那種福，但說說笑笑，坦白真摯的生活也得好。我們行船，經過許多地方。到非洲時，我還上岸去觀光。

船到香港，喜悅和憤怒一齊起來了。喜的是一別七年的祖國已在望，憤怒的是香港的那種建築一律是殖民地式，連顏色也一樣。以前未到歐洲不知道此種恥辱，到過了巴黎看過殖民地展覽會，和親眼看過非洲及安南等地的建築後，這種憤怒是不能不起來了。待到印度巡捕故意和我們爲難的時候，更加忿恨。以後到了上海，除像香港所得到的不快外，還加上碼頭工人的破爛的刺激，比起在巴黎影片裏看到的還難堪。

我在上海北四川路旁的一個亭子間裏會見了一別七年的母親。她比從前蒼老了許多。七年來，只靠自己養活自己，讓我去追求我的理想，她那種自我犧牲的母性使我自覺難受得很。我那時想我要好好的服侍她。不再讓她受苦了。

但是我找不到職業，我還要吃母親的飯。以後，搬了家，招收了幾個學提琴的學生，算是暫時解決了生活問題。

那年秋江北大水災我應了「南國社」友人之邀到南京要去看大水災後因故不能成行。在南京時跟過友人到歌女處聽唱，他們一邊和歌女週旋，我在旁記下她們的曲和情

緒。我想把我的音樂創作能夠充滿着各種被壓迫的同胞的呼聲，這樣我才能把音樂爲被壓迫的祖國服務。回上海後，我的第一個回國的作品寫成了，那是影片『時勢英雄』的插曲『運動會歌』。『一二九』運動起來，上海的大中學裏有些學生和我相識，他們寒假到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，要我寫個歌。我寫了個『我們要抵抗』，這是我第一個救亡歌曲（現在原稿都失掉了）。接着又寫了『戰歌』，『救國行進曲』。這兩個歌和『運動會歌』都收入百代公司唱片。因爲『戰歌』等的唱片銷路速度，打破了百代公司的其他唱片紀錄，百代公司願意聘請我了。我也滿意這個職業，因爲可以大大的收些救亡歌曲。可是這滿意很快被打消；『戰歌』的唱片及底片被沒收打毀後，百代公司的老闆就不願收救亡唱片了。我在那里，只是做做配音，做一些生意眼的工作。但這種工作耽擱我的時候不少，妨礙我的創作和發展；那時我覺得民族危機很深，我開始着手寫『民族交響樂』（大樂曲），要有很多時間才行。另一方面，百代公司待遇的不平（有些技術很差的薪水比我多八倍）和某些同事以買辦氣的惡態來對待我，我也很不快，因此不久我就辭職不幹。

一九三六年初，上海工部局（上海外人統治租界的政府）的音樂隊，答應給我開個音樂會演奏我的作品。籌備得差不多的時候，工部局及樂隊的領袖都不答應，結果備不成了。他們是不願意弱小民族有出頭一天的，何況他們一向都是演奏『最高尚』的音樂呢。

離開百代公司之後，我又開始了窮困的生活。雖然在百代公司裏有月薪一百元，但上海的應酬大，每月都不剩。可是我還能給影片寫些歌曲，有時一個歌能拿一百多元。我有了錢，除了家用外，就拿些來幫忙窮朋友，尤其是音樂界的；我對於中國的新音樂運動是熱心的，我應了當時的救亡歌曲運動者的要求，義務的給他們那些幹部教作曲指揮等。我也常常去到各界的歌詠班或班裏去教唱。

所以這個時期雖然失業，倒也不寂寞。

不久，新華影片公司要大做生意，又把我聘請做音樂部門的負責者（但不給我全權）。在這時期裏我寫了不少的曲：如搬夫曲，『夜半歌聲』的插曲，熱血，黃河之戀等。又作了拉犁歌，小孤女，瀟湘夜雨，青年進行曲等等。這些歌曲寫作的時候，已經是救國運動受到阻礙的時候，所以多是彎彎曲曲的說出心裏話，我作曲也只能寄怒號於悲鳴。但是，新華影片公司的老板漸漸投機了。他專門要拍古裝片，迎合低級趣味。他要弄『新毛毛雨』，我是不能答應的。他就慢慢擺出老板的面孔要我作『新毛毛雨』之類，他當我不知道我的曲的價值。他以爲一百五十元的月薪，就可把我全部的創作意志能力買下來了。但是我的良心不能使我這樣做，所以不久我又辭掉了職務不幹。我甯可挨窮，甯可分文不計的爲社會服務。

我仍在上海文化界戲劇界音樂界裏爲他們配曲，配音，教唱等。我以前曾寫過『復活』的插曲：茫茫西伯利亞，莫提起（在南京演出）。到此時，我又給『太平天國』寫插曲

：炭夫曲，打江山。還有『日出』裏的插曲。另外的寫些如沒有祖國的孩子，旱災歌，魯迅追悼歌等等。又爲『大雷雨』全部配音和寫插曲。都不要一個錢和報酬。

我在此時接觸了許多埋頭苦幹的人士，他們真心的爲祖國的事業來獻出全部力量；也看見了許多只顧出風頭的人物；也看見表面熱心實際壓迫人的人物。我不斷地寫作，我得到許多同胞的幫助鼓勵批評，也遭受過檢查，限制排斥。我以前所想的祖國是那麼天真簡單，現在沒有了。我有時也苦悶，但愉快的時候多。

我喜歡接近學生，尤其喜歡接近工人農民，我在工人的歌詠隊裏教唱，也到大場鄉下去教唱，他們對我的作品表示歡迎。我從他們的喜怒裏，尤其勞動的呼喊抗爭裏吸收新的力量到我的作品裏來。自然我對他們的了解還不夠，我的作品也還淺薄，不深入。可是比起在巴黎的作品充實得多。在巴黎的作品，連作風也未確定，只不過是有印象派的作風和帶上中國的風味吧了。而尤其覺得高興的，是我的作品那時已找到了一條路：吸收被壓迫人們的感情，對於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國的危亡的問題，是有把握了。我感覺我的作品已前進了一步，它和實際鬥爭初步的聯繫起來。

### （三） 從上海到武漢

『八一三』抗戰爆發，我參加了洪深兄領導的上海演劇第二大隊，離開上海到內地宣傳，經過了許多地方。最不



能忘的是一九三七年冬天，我們到湖北漢冶萍煤鐵礦場；我下到煤礦井的底層，觀察工人們的工作生活。我和他們談話。他們全身脫得精光，天一亮就下去，晚上才出井，整天看不見太陽，井底空氣惡劣，燈光不亮。我在那礦場裏參觀了好幾天，教工人們大合唱，工人們很願意和我接近。我在礦場裏作了「起重匠」。

以後我們到了武漢。

在武漢，演劇第二大隊的歌詠工作，成了推動武漢歌詠工作的中心，我每天工作十幾個鐘頭。武漢的歌詠隊到處建立，一直擴大到工場、商店、農村。與張曙兄合作開過許多歌詠大會，舉行過歌詠大遊行，遊行的時候，商店一起合唱起來了。

在武漢，這時期的工作最興奮，我作了保衛武漢，五一工人歌，新中國，祖國的孩子們，遊擊軍，華北農民歌，當兵歌，我們的隊伍向前走等。只是對於歌曲的漫無標準的檢查，監視救亡工作，甚至連「救亡」四字都不准用等現象很叫人不快。爲了工作方便，我想到政府去工作也許問題好商量，因此我就應軍事委員會政訓部俞空虛之邀，到部裏去工作。

但在第三廳裏工作困難更甚。外語粗淺的好幾十個歌詠團體遭合併爲一個隊，我把這個隊的幹部分到各團體中去，這個隊就領導不起來了。那些幹部被分配到各團體之後，因受種種限制，不能開展工作，有些則灰了心，有個別的竟墮落了；他們受物質的引誘，對工作消極，還有些